

谭仲池 朱汉民 主编

湖湘文化 名著读本

军事卷

陈先初 编著

谭仲池 朱汉民 主编

湖湘文化 名著读本

军事卷

陈先初 编著

湖湘文化重点研究基地（湖南大学）项目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晚清以降,湘人对军事学的兴趣骤然提高,对军事问题的关注迅速增强,随之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军事著述,形成了一支在军事学领域有出色表现的人才群体,历史上湖湘文化重文轻武的局面得以改观。本卷精选了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王鑫、王闿运、熊希龄、黄兴、蔡锷、毛泽东、粟裕共十二位湘籍人士论述军事问题的代表性文字,配之以各人的生平简介以及各篇文字之形成背景、思想主旨、时代意义的概括或揭示,文中涉及的一些知识点也作了必要注释。阅读本卷,有助于加深对湖湘军事文化的认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湘文化名著读本·军事卷/陈先初编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3. 4

(湖湘文化名著读本丛书)

ISBN 978-7-5667-0274-6

I. ①湖… II. ①陈… III. ①军事—著作—介绍—中国

IV. ①Z835 ②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3305号

湖湘文化名著读本(军事卷)

HUXIANG WENHUA MINGZHU DUBEN (JUNSHIJUAN)

主 编:陈先初 编著

责任编辑:肖立生 责任印制:陈 燕

印 装: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6开 印张:18 字数:333千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67-0274-6/E·10

定 价:38.00元

出 版 人:雷 鸣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822559(发行部),88821594(编辑室),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8649312(发行部),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pressxls@hnu.cn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湖湘文化名著读本》编委会

主 编	谭仲池	朱汉民		
编 委	程安亭	吕兴盛	杨先杰	罗社辉
	杨懿文	谭小平	李义伯	杨兴龙
	李伯成	王兴国	肖永明	张松辉
	陈松长	胡 遂	李清良	刘再华
	龚抗云	陈先初	殷 慧	

总序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区域文化之一。湖湘文化的特色与优势是什么？人们从不同角度曾做过概括，这对深化湖湘文化的研究和宣传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认为，湖湘文化的文源、文脉、文气几个方面，尤其体现其特色与优势。

其一，文源深。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史籍记载的“三皇五帝”，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历史，而湖湘文化与“三皇”中的炎帝、“五帝”中的舜帝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华文明史上，炎帝神农氏是农耕文化的奠基人，《周易·系辞》载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从湖南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如道县玉蟾岩遗址、澧县彭头山遗址，均证明了湖南地区在炎帝神农时代（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创立了比较发达的农业文明。后来，炎帝神农氏因为民治病、误食毒草而亡，葬于湖南酃县。可见，三皇之一的炎帝神农氏既是湖湘文化的开拓者，更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开拓者。五帝之一的舜帝则是中华道德文化的奠基人。舜帝是出生于中原地区的华夏部落聪明的首领，历史典籍大量记载他的道德精神，诸如孝敬父母、恭谦礼让、以德治国、举贤任能等，成为中华传统道德的典范。舜帝的道德精神在南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史记》记载他南巡时“崩于苍梧之野，葬于九疑”，此后，九疑山的舜帝之陵就成为湖湘儿女祭礼舜帝、表彰其道德文化的地方，从上古一直延续到今天。

湖湘文化的文源深，不仅仅是因为它与中华民族农耕文化、道德文化的源头相关，同时还因为它与中国古典文学与两宋道学的源头直接相关。中国古典诗歌有两个源头：北方的《诗经》与南方的《楚辞》。屈原是楚辞艺术的奠基人与杰出代表，而他的许多代表作品如《离骚》、《九歌》、《九章》、《天问》

等，大多是在他流放于湖南地区而创作的，并且吸收了沅湘之地的神话巫风，可见，湖湘文化为中国文学鼻祖屈原的诗歌作品提供了源头活水。其次，宋代被称为“道学宗主”、“理学开山祖”的周敦颐出生于湖南道县，以后又多年在湖南地区做官并从事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故而也是湘学的奠基人。屈原与周敦颐，“一为文学之鼻祖，一为理学之开山”（钱基博语），充分反映了湖湘文化源远流长，是“文源深”的最好体现。

其二，文脉广。

“文源深”着重从时间维度表达湖湘文化源流的悠久，而“文脉广”则着重从空间维度表达湖湘文化源流的广大。区域文化虽然是特指某一空间范围，但是区域文化的形成、演变、发展，均离不开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湖湘文化之所以获得很大发展，除了依靠本土文化的创造、继承外，还在于不断学习、吸收外来文化，故而具有文脉广的特点。湖湘文化形成的上古时期，中原文化与南方本土文化相结合则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炎帝神农氏”的出现，其实就是北方的英雄传说（炎帝）与南方的宗教信仰（农神）交流互渗的结果。而舜帝南巡逝世并葬九嶷，受到南方民众的普遍敬仰，亦体现出湖湘文化对中原道德文化的接受与吸收，另外，湖南本土的苗蛮文化，如果追溯其来源，亦是东夷文化的九黎部落南迁的结果。

作为文学鼻祖的屈原，其楚辞作品亦体现出文脉广的特点。一方面，他的诗歌渊源于沅湘巫歌，具有南音歌谣、巫风歌舞的地域特色与湖湘风情；另一方面，这些诗歌表现出对“美政”、“美人”的理想追求，特别是对舜帝这位远古圣王的崇敬，其文脉显然源于中原华夏民族文化。周敦颐之所以能够成为道德宗主、理学开山，固然是由于他能够继承齐鲁之风、孔孟学统，同时还与他大胆吸收、兼容佛教、道家与道教的思想有关。作为周敦颐理学思想的传承者，南宋胡宏、张栻在湖南地区创建的湖湘学派，也具有文脉广的特点。首先，湖湘学派起因于二程洛学南传，故而有浓厚的洛学特色；同时，湖湘学者又广泛地与闽学学派杨时、朱熹，与浙东学派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与江西学派陆九渊、陆九韶等开展学术交流，其文脉广大，故其学术有兼容并蓄的特点。王船山能够成就为清初三大学之一，仍然源于他文脉广的特点。他不但继承了南宋时期的湖湘学统，包括胡安国的《春秋》学、胡宏的人性论、张栻的知行论，尤继承张载关学的学术思想，将气学发扬光大，同时他也吸收了浙学的事功取向。再如晚清的那些湖湘学人，其思想学术无不具有文脉广的特

点。曾国藩将知识学问分成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门之学”，他本人能够在这四门之学中均取得突出的成就，就在于他文脉的广大，如义理之学源于洛闽，考据之学宗吴皖，辞章之学承桐城，经济之学则源于浙东、湖湘各地。可见，广泛的文脉成就了湖湘学人，也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大发展。

其三，文气足。

“文气”是一个古代文论的专有名词，一般用来指文章中所体现出作者的精神气质。而用“文气”来描述湖湘文化的特征时，就可能有狭义与广义的双重涵义。

狭义的“文气足”，专指那些在湖湘地区创作的作品或湖南人的文章中，能够充分表达出既具有地域特色、又充满生命活力与刚强质直的精神气质。湖南省作为一个文化大省，首先体现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一大批著名的作家。从文学鼻祖屈原算起，他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是最早的中国文学经典之一。以后，这里产生了许许多多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作品，如贾谊的《吊屈原赋》与《鹏鸟赋》，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周敦颐的《爱莲说》。明清至近代，湖南地区涌现了不计其数的文学名人与名篇，文学名家包括李东阳、王船山、曾国藩、何绍基、王闿运、丁玲、沈从文等等。十分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中均表现出一种充盈而劲悍的“文气”。最早提出“文气”说的曹丕曾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其实，这个“气”就是作者内在的精神气质。由于湖湘诗人、作家群体的精神气质大多是血性与灵性的结合，并表现出劲直、刚烈、气雄的特色，故而湖湘作家群及代表作品特别体现出文气足的特色。

文气足还有更加广义的理解，即某个人物群体所具有并表现出来的文化气质。由于湖湘之地有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加之宋以后湖湘教育发展很快，全国四大书院中湖南有岳麓、石鼓两所，这样，湖南人才群体普遍体现出一种特别的文化气质。当然，那些从事文学、学术等与“文”有关的人普遍具有文气，而那些从事政治、军事生涯的政治家、军人也表现出特别的文气。最为鲜明的晚清的湘军集团，这是一个具有“文气”的军事集团、政治集团，湘军集团的将领大部分均是文人学者出身，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能够治学为文，他们还以这种“文气”训练士兵，军营中常常传出琅琅书声。军队能够具有这样鲜明的文气，在历史上十分罕见。湘军的文气影响了以后的湖南军人，历史上

许多著名的军人如黄兴、蔡锷均显出鲜明的文气。同样，湖南的政治家也具有文化气质，表现得最充分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位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使得他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他又是一位创作了大量文学名篇的诗人，热爱哲学并且提出了系统哲学理论的哲学家。毛泽东成为一位历史上罕见的文气足的政治领袖。

为了让广大读者了解湖湘文化的文源、文脉、文气，我们特意编著了这一套《湖湘文化名著读本》。如果大家通过这一套书的阅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欣赏湖湘文化的文源、文脉、文气，这将是我们的最大快乐。

主 编

前言

人类社会中战争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在许多情况下，战争扮演了推动或阻碍历史进步的重要角色。战争离不开按特定方式组织起来的军队，离不开能致敌于死命的武器，离不开一定的战略战术。这些总括起来就是通常所谓军事，而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便是通常所谓军事学。

古代中国，并无军事学一说，人们使用的术语是兵学。“兵学”一词是在北宋时期出现的。但是如同战争现象很早即已出现一样，兵学的产生也很久远，至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其标志是作为“兵学圣典”的《孙子》以及《吴子》、《孙臆兵法》等兵学著作的诞生。此后，被称为兵书的兵学著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至清代中期，各种兵书已达两千余种之多。这些兵书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其最主要者为兵法、兵略、兵制、兵器之学。其中所谓兵法，系指传统军事理论，包括对战争的认识和理解，战争指导原则和方法，它是兵学的核心内容。所谓兵略，即是用于指导战争的谋略，它是实施战争的基本方针。所谓兵制，又称军制，是有关军事活动的各种制度，如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兵役制度、军队管理制度、后勤保障制度等等。所谓兵器，则牵涉到武器的制造和使用。历代兵书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或论述的过程，也就是兵学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

在兵学出现的同时，形成了专门研究军事问题的学派，即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的兵家。兵家在《汉书·艺文志》中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兵权谋家即战略家，其特点为“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注重军事战略研究，兼通形势、阴阳、技巧各派之长。兵形势家，特点为“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注重战术研究，探讨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战术运用的灵活性。兵阴阳家，特点为“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注重天时、地利与战争关系的研究，多阴阳五

行，甚至迷信内容。兵技巧家，特点为“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注重军事装备与军事技术的研究。兵家的形成表明，兵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经占有重要一席。

中国文化总体而言是一种具有温情特质的柔性文化，所谓以夷变夏，也多指汉民族用儒家文化对周边的蛮夷民族进行同化，而非仰仗武力。故而在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儒家文化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儒家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由核心地区向周边地区不断辐射、扩散，形成多个带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单元，湖湘文化即是其中之一。湖湘文化自宋代以后以理学见长，且因有周敦颐开理学之山，朱熹、张栻兴论道之风，被誉为“道南正脉”。在此文化气氛影响下，历史上的湖湘学人，多注重于理学的阐发、经学的探讨或文学的创作，于兵学则不甚留意。因此在中国传统的兵学领域，湘人并无特别表现，既未见有兵家人物留下美名，也未见有兵学著作传诸后世。

进入晚清之后，湖湘文化这一文强武弱的现象被打破。人们对军事学的兴趣骤然提高，对军事问题的关注迅速增强，随之而来的是陆续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军事著述，形成了一支在军事学领域有出色表现的人才群体（这一群体中有带兵将领或军事家，有社会活动家或政治家，也有少数文化人）。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弥补了湖湘文化的历史缺憾，为湖湘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湖湘文化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原因有二。其一，源于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复苏。经世致用是儒家文化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和发展动力，其表现于内，是以实事求是之精神追求真理，以求修己达人；表现于外，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胸怀关注国族，以求治国安邦。清代中叶，主要是康雍乾时期，经世思想一度被避世风气所遮蔽，进入嘉道时期，经世思潮再度兴起，人们的文化关注点再度回到现实中来。这对于一向具有天下抱负的湘人来说，无疑会在经世的意义上形成一种新的精神唤醒和激励。原因之二，源于社会现实的刺激。晚清中国乃是多事之秋。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不断以武力侵略中国，中国被迫以武力相抗，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保持的对外和平局面被战争打破。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促使人们在思考政治出路的同时，必然地去思考军事问题，即以怎样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去对付侵略者，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另外，近代中国由于社会矛盾激化，国内不同阶级之间或不同集团之间的战争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不断爆发，这也必然促使一些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代表人物从军事上进行种种谋划，以图打败对手，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上述两种

形式的战争，呈现出一个明显特点，即它们首先而且大多是发生于中国南部。湖南由于地缘关系，常常首当战争要冲，卷入之人也极多。于是在由战争开辟的历史进程中，造就了一批堪称卓越的军事将领或政治领袖，他们在领军作战的同时，结合对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就军队、战争所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探讨，并提出各自的见解和主张，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军事思想，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

既然湘人对军事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开启于战争的降临，那么他们在军事学领域之活动的展开，基本上也就与近代中国所经历的一系列大规模内外战争同步。大致说来，涉足军事学的这部分湘人，依据所参与的战争的不同性质（也有少数人没有参与战争，但他们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区分为不同的思想群体，而不同群体的前后相续，带来了认识上的不断深入，形成了传统军事思想向近代军事思想转型的新格局。

近代湘人之论军事，是自鸦片战争时期开始的。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主要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中国最后战败，中华民族自此出现严重危机。在此形势下，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开始觉醒，着手探讨应对之方，其中就包括湘人魏源。魏源以及禁烟英雄林则徐等人，主张严修武备，以甲兵止甲兵，坚决抵抗外来侵略；同时有感于列强船坚炮利，在军事技术上远胜中国，主张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此魏源先后撰成《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二书。前者在记述清朝开国以来历次重大军事活动、分析其成败得失的基础上，就城守、水守、军政、防苗、军储等“武事”发表专论，提出具体意见和见解。后者则在广泛介绍“夷情”的同时，议守、议战，全面谋划抵挡列强自海上入侵的“筹海”之策。魏源所撰两书，于兵制、军政等体制层面虽有检讨，创新不多，但显示了希望有所改革的基本意向。而所言师夷制夷，则已事关中国军事在武器装备方面的近代变革，事关中国军事发展的近代化方向。因此，魏源的军事论述揭开了中国军事思想转型的序幕，成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形成的起点，近代湖湘文化中之军事文化也由此发其端。

鸦片战争结束十余年之后，由于社会内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积累和激化，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不久又爆发了以捻军、回民、苗民等为主体的多次起义，各种起义席卷全国。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使腐朽的清朝正规武装八旗、绿营兵不堪一击，以湘军为代表的地方武装随之而起，成为镇压农

民起义的主力军。湘军的宗旨是捍卫名教，勤王忠君，此与以往军队无异。但其以封建士大夫为主干，以乡村质朴农民为兵源，采用“兵为将有”的管理方法，使军队出现了新的样式，战斗力也较以往大为增强。在湘军建立和成长的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军事统帅，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人传统文化根底深厚，重视历代兵家韬略，又善于从实战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于是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且具有特色的建军原则和作战方略。

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三四十年时间里，镇压农民起义与洋务运动先是相继展开，后是同时进行，其间又有反侵略战争及边疆收复战争的发生。在这些重大事件中，湘军将领充当了主要或重要角色，其军事思想也不断发展，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表现在治军方面，即是注重道德教化，强调选将用兵要谨守忠、勇、勤、恕、廉、明、公等传统道德，不求名，不怕死；同时要“爱民”不扰民，为百姓“作主”，视“军士与民为一家”。在军队建设上，则以练兵与制器为表里，借鉴西方国家的练兵方法训练队伍，同时主张通过采购和仿造西式船、炮改善军队装备，提高作战水平。在国防战略上，针对统治集团内部在陆、海边境双重危机压迫下展开的塞防海防争论，提出两防并重战略方针，此一方针纠正了重海防轻塞防的倾向，推动清政府作出了收复新疆的战略决策。而在执行此一决策的过程中，又提出并遵循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军事战略，保证了新疆的成功收复。在战术方针上，则根据内外战争的不同特点，各有侧重。曾、左、彭、胡等湘军将帅的这些军事思想或军事主张，继续体现出某些时代特点，如在向西方学习上有了较大进展，国防战略的谋划上视野也更加开阔。但是由于当时国人的总体思维模式还是中体西用，由此严重限制了人们的认识；加上湘军从性质上讲仍然是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武装力量，因此与之互为表里的湘军将帅们的军事思想，特别是在建军治军、军政军制等方面的认识和主张，便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难以形成本质上的突破。

19世纪90年代中期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又一次遭到失败，洋务运动期间用新式舰船装备起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这暴露出中国军事力量的落后不仅仅是武器还有体制。于是群臣百官纷纷条陈时务，主张效仿西方，编练新军，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军队落后的局面。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按照西方模式，从军制、装备、战法、军事教育、部队管理等方面对军队进行全

面改革。自此，中国军队在国家层面开始进入近代化建设轨道，中国军事思想的近代转型也由此提速。这一过程持续到辛亥革命前夕。

在这一中国军队改革的过程中，湘人思想活跃，表现不俗。其中有两人特别突出，一是熊希龄，一是蔡锷。熊希龄是戊戌维新运动的支持者和参加者，后来又参与官方立宪活动，思想趋新。甲午战败不久，出于对中国军队建设的关注，他写成《军制篇》这篇专论军事改革的长文。该文分析了史上各朝代特别是清代兵制的种种弊端，提出“正名分”、“划军区”、“定征兵”三条军事改革方案，即参照西欧、日本近代建军之经验，改“兵为将有”为国家所有，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废除塘汛制和防营制，实行军区制，以利军队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部署和调度；废除募兵制，实行征兵制，以扩大兵源，并增强国人义务服役意识。《军制篇》所论，重在对旧式军队体制进行改革，进而形成与西方军制相仿的军队体制，实现军队建设的近代化，反映出熊希龄对世界先进军事文化及军事制度的洞察和把握。《军制篇》在近代中国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建设近代化军队的整体构想，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正因此，时人称其“于古今中外军事融会贯通”，是为“中国改革新军之嚆矢”。蔡锷出身行伍，曾任新军军官及教官，对军事改革十分热心。辛亥革命前他撰成《军事计划》之长文，就中国军事改革及建设（主要是陆军）所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总体构想。他特别从国力与武力的结合上立论，强调近百年来，一切政治之原动及国制组织之根本为立宪制度，一切军事之原动及国军组织之根本为义务兵役制，此二者之于近代国家，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而就国力言，关键在予国民以法律上之平等自由，使全体国民进步发达。这已超过了以往甚至当时大多数人在军事问题上的狭隘视界，将军事近代化与政治近代化联系起来，故而，《军事计划》成了一份谋求在政治近代化之基础上实现中国军事近代化的方案。熊希龄和蔡锷出身一文一武，然在甲午战争之后，均对中国军事改革予以了特别关注，而且各自提出了具有近代化指向的军事改革方案。他们的军事思考和所提方案表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已经朝着近代方向成功转型。

辛亥革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革命造就了一批政治领袖兼军事领袖，湘人黄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黄兴曾先后参与制订以广州为中心和以武昌为中心的起义计划，并亲自指挥多次武装起义，在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武昌起义后相继担任民军战时总司令、临时政府陆军总长，成

为革命派和民国政府主持军事工作最主要的负责人。黄兴没有发表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但在主持军事工作期间，所发表的一些书信、讲话、通电等文件，包含了不少有价值的军事思想。他强调要从严治军，军人打仗要讲求服从和协同，要把遵守纪律、服从命令视为当然之义务。军人应以爱国（爱民国）为唯一宗旨，绝对服从国家需要，“以生命卖与国家”，不应于军人名义之外别树党派，致造成党派分歧而损害国家利益。军队不仅要具有一定规模，还要特别注重提高质量，为此军人要加强学习和训练，掌握扎实本领，切实担起保障民国之责任。这些观点或主张，直接服从和服务于民主主义革命和民主共和国的需要，因而成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袁世凯掌权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的时代，同时也开始了国内长达十多年的反军阀斗争。在这一斗争过程中，中国军事思想的近代化继续推进。特别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在军队中实行党代表制度，加强军队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工作，造就与民众结合的新型武装力量，为中国军事思想增添了新内容。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人被迫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自此，在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园地中，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之外，逐渐形成了一种性质上完全不同的军事思想，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军事思想。无产阶级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共同智慧的结晶，而其中，一批著名的湘籍革命家、军事家，做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比如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军队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使军队成为执行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军事工具。为此，他从井冈山斗争开始，就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从组织上保证“党指挥枪”这一原则的落实；重视军队的宗旨教育，规定人民军队要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要始终保持军队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人民军队的任务不是单纯打仗一项，除打仗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建立革命政权以及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还要从事生产，既要当好战斗队，又要当好工作队和生产队，如此才不怕任何困难，才会无敌于天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军事战略战术上，紧密结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表现出高度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探讨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特点，着重论述了在“围剿”和反“围剿”这一主要内战形式下的战略防御、战略反攻以及正规战、运动战、歼

灭战的战略战术问题。抗日战争时期，他写成了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根据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论证了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战争的胜利属于中国；科学预见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作为转变的枢纽，将起决定性作用；指出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具体的战略方针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而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主要包括他在总结以往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等十大军事原则，以及在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的不同阶段，就战略进攻、战略决战所制定的战略战术。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他在不同时期提出的战略战术，构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整体，这一包含了同时代其他革命家和军事家（其中湘籍出身的主要有粟裕、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的智慧在内的军事思想，是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最杰出成果。它不仅从军事上保证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且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即无产阶级的思想形态，把中国军事思想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综上所述，中国兵学自古代产生以来，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而进入晚清以后，又经历了军事思想的近代转型。转型后的中国军事思想，相继呈现出两种主要形态，即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和无产阶级的军事思想，它们表现为一大批军事、政治人物和部分军事爱好者就军事问题所进行的思考和探讨，以及就实际军事活动提出的战略战术。这些人物遍及全国，但有不少出自湖湘，本书所录诸篇，即是湘人的代表之作。湘人在军事理论方面的成就，丰富了近代中国军事思想的宝库，也为近代湖湘文化乃至近代中国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史料缺乏，本书所选录之湘人军事著述，仅限于晚清以后的中国近代。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如此，本书所选也未必周全。其中有的或许称不上军事理论著作而只是针对具体战事的应用性文件，但考虑到作者的代表性和特定时期的整体思想水平，仍将其选入；有的论著不乏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因所属思想群体已有作品入选，加上本书篇幅所限，又只好割爱。本书的这种处

理方式，是否妥当，还请读者评议、指正。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本卷的编选体例。本卷体例，与其他各卷大体一致，即依作者选编文本，然后对文本进行评析。评析多系一篇一评，但也有例外：对于少数出自同一位作者且涉及同一类问题的若干条言论，或同一位作者就某一重大军事活动或军事议题所发表的若干篇文字，采取了集中评析的形式。这种例外形式的适当采用，主要针对一些特殊情形，不仅于基本体例无有大碍，而且有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目次

前言	001
魏源	001
筹海篇（节选）	002
曾国藩、胡林翼	020
曾胡治兵语录	021
爱民歌	045
左宗棠	047
论治军用兵	048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节选）	052
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节选）	055
官军出关宜分起行走并筹粮运事宜折（节选）	059
附陈开屯实在情形片（节选）	060
遵旨密陈片（节选）	061
督办新疆军务敬陈筹画情形折（节选）	063
新疆贼势大概片（节选）	064
详陈攻拔古牧地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战状	
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节选）	065
驰抵肃州各军分起出关折（节选）	066
请裁汰北路征军折（节选）	066
湘军刘总统稟病痊筹议进兵南路由（节选）	067
遵旨统筹全局折（节选）	069